

当代中国文化变迁:基于社会动力学机制的理解

李强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

DOI:10.12238/jief.v7i6.14981

[摘要] 当代中国文化变迁是多种内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若仅就当代中国文化来说,其变迁过程主要以制度、市场、技术和社会大众这四大要素的作用为主。因此,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作为观照,从四个维度解析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在文化中的表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个要素对文化变迁的副作用,并相应地对未来文化变化以及文化动力学体制机制建构的可能方向做出判断。

[关键词] 文化变迁; 动力学; 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Dynamics

Qiang Li

THE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Abstract]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As far a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s concerned, the process of chang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role of the four major elements: system, market, technology and the public.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its performance in culture from four dimensions, and analyzes the side effects of each element on cultural change based on this, and accordingly makes judgments on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future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ynamics system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cultural change; Dynamics; popular culture

引言

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多维度要素复杂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彻底改变了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经历了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到契约体系的转型。在“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社会文化也在时空压缩的巨大张力下形成了“传统-现代-后现代”三层文化并存的独特景观。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这种并存的张力在接受西方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被放大,又在数字技术革命的加持下出现裂解和重构,进而出现了社会内部文化价值重估和范式转换,对外则出现了文化的单向输入向双向互动转变的趋势。本文试图以制度、市场、技术和大众四个维度编织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进程。

1 四个维度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及文化表现分析

1.1 制度

制度作为社会动力学机制的核心维度,在现代中国文化变迁中发挥着结构性、导向性和保障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在几

十年的探索中形成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是分析中国文化变迁的制度动力机制的基本出发点。而在具体的变迁进程中,制度往往通过政策供给、规则建构与组织创新,形成党领导下的“顶层设计-基层创新”双向互动的独特机制,以渐进式改革和弹性调控实现文化秩序的不断重塑,进而推动文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顶层机制上从过去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中式的文化管理体制逐步转向,对文化的相对独立和对社会的能动作用给予了更高的重视,具体政策上则推动国有文化单位的承包责任制,培育市场主体,逐步推进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和法制化,创造了活跃而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在建设市场的同时,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相关项目不断增加,基础层文化设施不断增加和完善,同时民间力量也在政策的指导和鼓励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创办实体,参与志愿服务等等,构建起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和社会共同建设文化事业的新局面。

此外,制度对文化的形塑有时也会产生制度设计初衷之外的效应,比如在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催生的2.8亿农民工群体不见容于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模式的“悬浮”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打工文学”等等文化现象。

1.2 市场

市场是文化变迁中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最灵活的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释放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旨趣也在市场的大潮中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前后“样板戏”到“邓丽君”的变化,即是通过市场反映了人们客观的文化需要。市场机制以价格信号取代行政命令,以需求牵引替代计划主导,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调动了社会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也使文化产品从精英导向的转为大众导向,促进了文化民主化和草根文化的繁荣,例如相声、话剧等艺术从电视回归剧场,以及线下脱口秀的出现等等。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市场领域,如网络文学市场,孕育出了诸如阅文、晋江、起点等大型平台,中国的网络小说经过翻译或者制成短视频,即使部分作品翻译质量欠佳,仍然能够在海外收获大批拥趸。这种最通俗的文化产品甚至形成大规模出海的局面,用市场的方式实现了文化输出。

在传统认知中的非市场的文化场域,诸如价值宣传、传统文化保护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市场化手段同样能够发挥其效能。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觉醒年代》《山海情》《万里归途》等等,由政府主导,采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结合良性的宣发,引起社会文化以及舆论的热烈反响。大众对这些作品的讨论不仅局限于影视,而是扩散到历史、文化和社会层面,不仅收获了良好的市场效果,还完成了主旋律作品的宣传使命。时下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译和创新,在如今回归传统文化的风潮之下备受追捧,如故宫的文创产品各地人文旅游的火爆,以及“打铁花”等非遗展演项目,在市场中让传统文化和非遗等在社会中重新“活”过来,实现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的统一。

1.3 技术

技术作为客观上的底层要素,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的变化并形塑了现代文化样貌。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和快速迭代不仅形塑着新技术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和传播体系,更引发价值范式与文化生态的重构,形成了创造性的变革图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文化传播的成本和门槛。在文化传播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受众可以轻松接触各类最优质的艺术表演,而基于5G低延迟网络技术基础上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则让文化的跨时空体验成为可能,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如《国家宝藏》节目通过新媒体技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手段结合,提升了观众的文化体验;又如各地兴起的数字博物馆建设以及虚拟现实体验项目诸如“数字敦煌”“数字故宫”“云游长城”等等,利用数字技

术既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又实现了其文化体验和宣传价值。

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范式的革命。文化生产由过去的文化机构主导走向全民创造:B站、小红书等平台的自媒体迅猛发展,甚至超越主流媒体影响力,短视频日均1.5亿条的视频产出量以及UGC(用户生成内容)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文化生产和传播,这些文化领域的“草根英雄”们的大量出现推动了文化领域的分众化,消解着既往权威机构的文化垄断。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创作和文化消费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1.4 大众

人是文化变迁动力学中最能动的要素。大众既是历史传统的直接承载者,又是文化创新转型的直接实践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催生出多样的价值范式和文化追求,文化场域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趋势。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大众逐渐由被动的文化接受者向主动的文化创造者转变,形成“全民创作”“全民传播”的文化景观。同时,网络世界低成本和高可及性的互联互通让以兴趣爱好和共同的文化旨趣为纽带的群体联结,即亚文化圈层成为可能。亚文化圈层“强认同-弱壁垒”的结构使得各种亚文化频频“破圈”,获得圈层之外的巨大影响力。例如,二次元群体核心用户约1.2亿,而《原神》的全球用户却超过5亿。这种“圈地自萌”与“跨界破壁”的张力构成文化创新的全新的动力源。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大众的文化主动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2021年河南水灾事件中,服饰企业鸿星尔克表现出的强烈社会担当受到网友热情“回报”——其产品被疯狂抢购,这家企业也因此扭转了多年的经营困难的局面。群众看似“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实质上是价值认同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又在客观上形成了大众主动选择和形塑文化的结果。这种能动性在互联网加持下被成倍放大,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2 动力机制的阻滞

2.1 制度调节的滞后性

在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制度是相对固定的要素,在中国语境下则更是如此,稳定性与连续性往往在制度形成过程中作为优先考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即表现为“制度试错—文化反馈—体系改进”的制度生成模式。然而在现如今文化现象涌现速度大大加快且难以预测和掌控的局面下,这种模式正在遭遇更大的挑战。首先,制度的调整 and 政策的出台往往只能基于既成事实而进行,诸如“饭圈整治”政策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不良势头之后,限制演员天价片酬也是在影视行业内已形成“流量为王”的非良性生态之后等等。其次,制度的刚性与文化流变的对抗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由于制度标准的统一性要求,其在复杂的现实文化场域往往被批评“一刀切”。此外,政策制

定层面与文化实践层面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导致制度难以符合市场和文化领域直接现实的需求,多用禁令而非引导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耽改剧的禁令和对于网红马保国的封杀引发网络舆论的讨论。

2.2 市场的盲目性

尽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其逐利本质也导致市场不可避免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在市场中,企业为降低风险通常会更倾向于采取“跟随策略”,通过学习和模仿成功案例以规避创新成本,特别是文化领域,“爆款”的出现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种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羊群效应”下的集体非理性决策更容易产生,从而导致文化生产偏离多样化需求。如常州梳篦、开封文旅纪念品等非遗项目,因缺乏创新和资金支持,产品设计普遍模仿传统样式,未能结合现代审美需求,导致地域文化特色被稀释。又如大研、大理等古镇的商铺业态高度雷同,以廉价手工艺品、网红小吃为主,削弱了古镇的历史文化内涵。此外,在新兴的微短剧行业普遍出现人物形象脸谱化、剧情走向套路化的问题。在数字读物领域,喜马拉雅平台上的传统文化类儿童音频产品,因追求流量最大化,内容多集中于《三字经》《百家姓》等文本的机械化复述,缺乏创新叙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次,文化资源的资本化和过度商业化往往导致对原生文化的破坏与价值内核的抽离。周庄、乌镇等江南小镇为了经济效益,原住民大量被商业租户替代,传统居民和生活方式被挤出,使得古镇原真性景观特征流失率达60%以上。西江苗寨的商业区与生活区混杂交织,导致民俗仪式沦为表演项目,失去社区传承的文化功能。又如成都锦里古街将三国文化转化为“小吃+仿古建筑”的消费符号,传统文化沦为商业噱头,游客体验停留于浅层感官刺激。类似的商业化开发既不利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也不利于文化资源的长期合理利用,易形成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2.3 技术的双面性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的冲击下,技术已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核心动力。这种变革既催生了文化创新与传播效率的提升,也引发了深层次的文化异化与价值撕裂。如今算法推荐技术为每个人精心编织了信息茧房,让多数数字时代的居民深陷其中。这种信息茧房导致了双重后果:其一是通过偏好强化进一步训练受众的口味,固化文化选择,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个人的认知、价值与文化偏见,最终导致社会整体认知的混乱和价值撕裂;其二是大数据推动的文化生产让算法推荐倾向于迎合主流文化,驱赶人们专注于时兴潮流以及易于传播的“短、平、快”的内容,导致文化同质化和空洞化加剧,阻碍了边缘文化的存续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消费端,人们沉浸在短视频文化中,长思考能力受到侵蚀;在生产端,“网红模板-复制传播

-引流带货”的循环固化了流量经济的商业逻辑,同时削弱了文化向不同方向探索和延伸的动力。

2.4 价值重构和认同危机

在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意识发生剧烈变化,新文化现象的大量涌现,这又导致了文化转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失序和价值失范。从根本上看,文化发展的土壤由农业农村社会转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礼仪习俗和文化价值与现代社会脱节,而社会价值变化的相对迟滞则客观上造成了价值和理念形成张力与冲突的空间。这种争议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同代际群体对其他人生活方式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一些传统礼俗和观念诸如彩礼问题的争议当代中国。再比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与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重义轻利观念产生冲突。此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挑战,一些争议通过互联网被成倍放大,形成当下相对激烈的舆论环境,加剧了文化的割裂。

3 突破策略与未来展望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面对当今社会文化呈现复杂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变化趋势,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点着力,顺应趋势、积极有为,力图扩大文化变迁带来的正面效应,减低其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

首先,以“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力平衡”推动文化稳步健康发展。这一框架强调在文化建设中,政府的主导、市场的能动性、社会的参与三者协同共生,形成动态平衡的格局,既避免单一主体垄断导致文化发展的偏离,又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这要求政府的监管向标准化、法制化、规则化演进,给市场划定明确边界,同时也保护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以促进文化市场良性发展,避免市场无序和资本盲目扩张对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造成破坏和冲击。而社会组织和非市场民间力量的参与则一方面可以限制市场和资本盲目扩张对文化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监管机制的滞后性的有效补充和纠正。

其次,加强政府监管与主体的文化自觉,发挥技术的正向效应。在技术深度重构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当下,这要求政府以敏捷监管引导技术向善,市场主体通过技术伦理内化实现创新自律,社会形成技术应用的集体文化认知,最终形成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良性生态。

再次,坚持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势必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传统文化的创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创新也不应是简单的形式改良,而应该是在充分尊重历史,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的适应性改进与突破。文化创新要守住传统文化的根脉,也要能够激发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接受,从而建构广泛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凝聚力。

4 结语

文化变迁是一个多要素持续综合作用的过程。本文将当下中国文化变迁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归纳为制度、市场、技术和社会大众这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作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分别有其优势和不足,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牵连。规范的制度、健康有序的市场、技术向善的趋向、社会大众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这几项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建立一个多要素协同推进的文化发展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陈少峰.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文化与科技融合及其产业形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59.
- [2]万林艳,李婧婷.试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机制[J].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2):56-60+73.

[3]金晓彤,崔宏静.试论我国文化消费与文化发展的大众化走向[J].宁夏社会科学,2015,(02):157-162.

[4]傅才武,何璇.四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反思[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43-56.

[5]陈希颜,陈立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善文化政策的实践与历程[J].观察与思考,2021,(08):80-88.

[6]高丙中.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J].社会学研究,1997,(01):115-119.

作者简介:

李强(1994—),男,山西省襄汾县人,博士,单位: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化的地缘政治要素。